

both written accounts of Ruan Yuan and oral lore about his family. Thus Wei's book builds on and goes beyond earlier published works and archival sources. Her account adds many new detail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 dimensions of Ruan's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career.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we see through Ruan's "life and times" a dynastic era in transition from a late empire 晚期帝國 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 近世時代.

Specialist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history in particular will find the many sources and rich information in this volume of great value. Wei presents such a solidly nuanced biography of Ruan Yuan that her account is a must read for specialist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But the book's comprehensiveness on Ruan Yuan's political career also makes it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i's meticulous use of numerous archives enables her to present the broader history of the period and define the multiple intellectual agenda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oreov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as produced this book with numerous maps, tables, appendices, bibliographies, and illustrations, thus making this important research accessible to the non-specialist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want a taste of what the life of a late imperial Chinese official was like in the Celestial Bureaucracy 天朝 before the Opium War.

BENJAMIN A.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Merchant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Madeleine Zel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xxiv + 404. \$45.00/£29.00.

本書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Madeleine Zelin所撰，是近年中國商業史英文論著中最具份量的力作，面世不足一年即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費正清獎 (John K. Fairbank Prize)。¹

過去研究中華帝國晚期商業史的論著，所致力者主要為活躍於歷史舞台的顯赫商業勢力，如：雄峙南北的山西及徽州(新安)商人、揚州鹽商、廣東洋商和通商口岸買辦等。自貢僻處四川南部一隅，雖以產鹽著稱，但因交通阻隔，商人的知名度自難與上述財力雄厚或活動範圍遼闊的商人群相比，故每為學者所忽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與自貢相關的原始檔案都塵封於四川或當地檔案館內，中外學者無從問津；這一課題的研究亦因直接史料缺乏而不易著力。

¹ 該獎設於1968年，每兩年頒發一次，1985年改為每年頒發，獎金亦從五百增為一千美元，頒給大體上以1800年後的東亞(中國[包括東北及新疆]、蒙古、日本、朝鮮及越南)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傑出著作。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還，情況有所改觀。最為重要的就是相關檔案開始對外陸續開放，一本從原始檔案整理出來，彌足珍貴的史料集《自貢鹽業契約檔案選輯》(1732-1949)亦於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四川與省內作為鹽業中心的自貢，即已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對相關當事人密集訪談，記錄並編集為數以百計的口述歷史。這些史料蒐集活動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採訪活動恢復並持續至今，多冊的《自貢文史資料選輯》及《四川文史資料選輯》即為其具體成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編纂，多種涵蓋以二十世紀為主的自貢市各方面的地方志相繼刊行，為深入研究創造了更成熟的條件。作者因緣際會，在這有利的氛圍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即已從事研究自貢商人這一課題，先後就自貢的地方菁英盛衰、鹽場的資本累積與投資策略、經營型態、商人爭端仲裁等方面，撰有論文數篇，在中外學術書刊發表。換言之，作者對這課題從著手研究到撰著成書，歷時逾二十年；本書就研究的深度及廣度而論，實非同類著作所可比肩。

作者在序言中申明本書目標有二：(一)更深入地理解建構中國本土經濟發展的制度；(二)嘗試將中國商業史置於十九及二十世紀初的公司商號更為廣闊的比較歷史背景中，並進而說明其地位。從清中葉開始四川富順自流井和榮縣貢井(合稱自貢)鹽場出現的首批資力厚、產能高的私營工業企業百年間的興衰；當地個別經營的商人為了開發新技術、獲取新市場、支撐合股商業組織所部署、動用及操控的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資源，以及在這邊陲都市菁英形成的歷史，便是本書細述的重點。

先將全書內容簡介如下：全書共十章，最後為結語。第一章檢視晚清四川鹽商與中國別處鹽商根本不同的經商環境；就自貢富榮鹽場而論，其初期發展的條件是由技術和政治所共同創造，其中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鑿井技術(深鑽)的改進，促成了鹽區深地層所蘊藏的大量天然氣及黑鹵²的開發，成為當地產鹽業一大轉捩點。第二、三兩章的主題是自貢商人立業的過程，細察他們藉親屬關係的傳統和當地合股市場的發展，結合大批地區家庭未充份利用的資金，從事創新而冒險的投資。企業資本累積的基本形式是以契約為基礎的無限責任合股制，其最獨特之處為股份商品化。這樣的投資及資源配置模式助長鹽場所有制的分裂。第四章指出十九世紀中葉，業者開始將銷售和原料供應結合為一體，而這須有專業化的管理團隊協調配合。企業一體化透過由大家族組成的信託機構「堂」而完善；它們是一體化企業的最有力投資者，也是最大的獲益者。第五章詳述富榮鹽場勞工的勞動環境及就業情況、組織(藉鄉誼、民間宗教、行會等結合)及抗爭(為薪酬、工作

² 鹽井鑽探至3千呎的岩層所獲得的黑鹵水，含鹽濃度為18%，而先前鑽探深度在2千呎至2.3千呎取得的黃鹵，含鹽成份只有13%。

條件等)。第六章檢視晚清四川鹽政改造的主要組成部份，評估新遊戲規則(目標為運往湖廣〔濟楚〕的川鹽)對該省產鹽業者、市場、業務結構的影響。第七章闡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岩鹽³的發現與新興生產技術(二十世紀初機車汲滷的採用等)對清末民初自貢製鹽業進一步轉變的作用；影響所及，既創造新的規模節約，也改變滷主與天然氣主之間的勢力均衡。第八章考察商業環境面對二鉅變——西力(以技術為形式)衝擊及經商手法不同於舊人的一批具代表性的新商出現——的背景下，新舊商業菁英之間的興替。第九章論述影響清末民初自貢商人的政治和制度因素，檢視一些決定新舊二代業者抉擇的重大事件。作者對這個過渡時期中一些中國經濟史中甚具爭議性的問題，諸如：文化、國家在商業習慣形成、競爭的作用作新的探索，冀望能更為細緻地顯現影響近代中國早期商業機構及商業業績的勢力。第十章詳述自貢與其腹地的關係。儘管四周受制於運輸不便，自貢的影響力延伸遠及於半徑數百哩的農村腹地；四川南部的農產品及手工業品都是應自貢的需要而生，販牛業、竹木業、煎鹽鍋製造業就是明顯例證。自貢與其周圍地區經濟互利的榮景，到二十世紀逐漸消散。

書中製鹽技術及經營組織部份錯綜複雜，涉及不少專門術語和經濟學理概念，而作為書中要角的自貢業鹽的大家族和其他群體成員，大都為通行史書中隱晦而不見經傳的人物；一般讀者要掌握書中要領實有困難。可喜的是，作者在這方面盡量以簡馭繁，而序言及每章的開首及結尾，都提綱挈領地將全書及各章的內容作了提要，對閱讀本書具有相當重要的指引作用。

本書問世前，中國大陸也有部份學者隨著原始檔案的開放整理，對自貢鹽業展開研究，獲得頗為豐碩的成果；其中吳天穎、冉光榮、張學君、彭澤益、彭久松、陳然等的業績尤為顯著。整體而論，他們著力最深的部份要算是藉著四川(主要是自貢)鹽業契約來分析鹽業的經營型態，其中吳天穎、冉光榮所撰的兩篇論文〈四川鹽業契約文書初步研究〉及〈川鹽鑿井契約文書源流述論〉堪稱代表作。⁴ 作者一方面汲取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前人業績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推陳出新，發前人未發之覆。本書無論在史料運用、取徑、視野，以至分析論證各方面，較諸先前相關論著，無疑是後來居上。以史料來說，作者除利用先前論著所用的自貢市檔案館所藏檔案(鹽業契約、商會文書等)、《契約檔案選輯》、口述回憶錄如《文史資料選輯》，以及官文書、地志等外，更引用四川巴縣檔案、中國

³ 鑽探至3千呎或以上而發現的岩鹽滷，含鹽濃度高達25–33%。

⁴ 前者篇幅近三百頁，收於《自貢鹽業契約檔案選輯》內；後者篇幅近百頁，載吳天穎：《井鹽史探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一篇篇幅較短，但專集中討論自貢，且發表更早的先導性論文為張學君、冉光榮：〈清代富榮鹽場經營契約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1年第3期。

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錄副奏摺——「農業類·雨雪糧價」檔案、《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調查》(收入蕭錚〔主編〕：《民國二三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編纂的多種自貢地方志等。即便是本書重要史料之一的《文史資料選輯》，作者因對其性質的局限甚為了解，故引用時盡量避免接受當事人的主觀結論，只從其所述往事中檢出其經營的機構運作，所遇問題及所作選擇等線索，再與其他相關史料反覆核對查證後而立論；這種小心謹慎運用史料，不隨便輕信的態度，在大陸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實為罕見。就視野而論，先前學者所致力，多側重鹽業某一方面，如經營型態、生產工藝，工人鬥爭、軍閥劫掠、資產階級與地方議事會等課題，鮮見組織結構深廣度兼顧，對問題作全面而細緻處理的綜合性成果。⁵ 本書涉及的層面雖多，但主線明確，汲取及適度援引經濟學理與西方經濟史家(如Alfred Chandler, Naomi Lamoreaux, Nathan Rosenberg, Richard Stylla等)的研究成果以資比較，從而提出獨到的見解。作者取徑是從小處入手，大處著眼，微觀宏觀結合，見樹又見林，成功地使自貢成為早期工業企業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個案。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熟練地駕馭豐富的材料，以詳盡的分析論證，徹底研究自貢的商業習慣、組織、資本累積、生產技術等多個領域，提出新見，挑戰成說。中國工業化不能起飛，論者多謂資本匱乏為其主因，而國民生計不足，儲蓄微薄及信用機構不健全更是其中癥結所在。少數學者則認為戰前中國國民生產中可觀的比重耗用於非必要消費上，故問題不在於貧乏，而在於不能將潛在的剩餘轉導入投資的途徑。唯持論者只提出粗略的數據估計，並無具體例證支持。一般認為中國商人只追求目前短暫利潤，甚少作長期打算，故投資大，回本期長的企業，一向乏人問津；而中國經濟落後，幾眾口一詞認定為商律不存及「家庭主義」所致。作者以自貢商人為例，針對以上成說，提出質疑。書中指出當地家庭有限的財富累積，與產鹽業的資本要求不成比例，為解決這問題，將當地商業習慣與四川農礦業中已高度發展的契約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合股制，遂應運而生，股份商品化則為這一過程的直接結果。股份買賣使得井、灶開發可資利用股份市場以舒緩資本不足，將商號壽命推展至原投資者的資金或其本人存歿之外，讓商號更能控制生產投入，這要比以現金收購生產的資產更為靈活。持股則全取決於契約；其中「上

⁵ 就所見的兩種綜合性成果而論，張學君、冉光榮合著的《明清四川井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四川整個井鹽業為研究對象，而稍偏重於自貢。因時限關係，自貢由盛轉衰的民國時期則付諸闕如。王仁遠、陳然、曾凡英編著的《自貢城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算是一本真正的綜合性著作，但因涉及範圍枝蔓，聚焦不明，且限於篇幅，很多重要問題只能點到即止，失之於粗糙。

下節」⁶讓渡做法的發展，既促進資本累積薄弱情況下的投資，也保證至少在鹽場興旺時，多數具生產潛力的鹽井都可獲資金挹注，凡此可見資本市場的彈性。家族信託機構在鹽區親屬集資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它們是合股制中最積極的投資者，所有大商號都以之作為組織基礎。它們是現代商業環境中法人的替代物，既為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也是防止資產分散的保障，確保投資股份的持續性及一體性。凡此都足證家庭是商業上成功的要素。鑽鑿滷井初期沒有資金但擁有廠井基址的地主，藉著經營契約，與在鹽區沒有土地使用權的投資者結合，就是生產要素交易的微妙方法。換言之，自貢富榮鹽場發展之初，就是以制度機制取代金融手段，使眾多財力有限的家庭得以組合資源、分散風險，提供工業相當的靈活性以應付不斷變動的市場狀況。從鹽業發展所見，資力大小不一的業者出於獲利的預期，雖明知鹽井開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餘年，有數十年更數姓而見功者」，以及固定投入所耗不貲，但都願意把資金作長期投資。直至二十世紀初，雖沒有國家所公布的公司法及商律，但因契約及習慣法（例如極為專門而合乎法律根據的場規）一貫執行，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為維持因諸如上下節再三讓渡等原因造成的日益複雜的合股關係，遂促進精細詳盡的習慣法的發展。二十世紀前，這些地區性商業習慣法的意義實不容漠視。

作者發現在西力衝擊前，自貢的富榮鹽場資本的管理機制已顯示出近代工業企業的很多特色，但全與西方無關。十九世紀中葉前後，以家族為基礎的大商號採用專業化層級的管理組織，引進非持股人或非親屬的管理團隊，日常運作交由受薪全職經理人掌管，而投資、資金分配、經理人的招募等長期的決策，則依然集於少數所有人手中。二十世紀初所發展起來，頗為複雜，合稱為「大關」的管理組織，便是經營與管理更進一步專業化最為鮮明的例子。隨著工業發展成熟，很多合股組織因各種原因持續分裂；為滷井本身的業務運作，大關即充當總管理機構，監督滷井每日的營運及保養。大關的最重要職責，很清楚就是要在競爭而相交的利益中任公正不倚的仲裁人；生產力則為其決斷的主要因素。很多大關代表都是從合股人中挑選出來，他們主要發揮董事會的作用，而每日經營則委諸一位受薪經理及在技術及管理方面具有專門知識的下屬。大關各項工作所獲資助的模式大致有二：（一）契約規定大關撥出一些股份或一定數量的天然氣留給自用，以收入

⁶ 鑽井耗資費時，有人鑽鑿多年，資金耗盡，徒勞無功，進退失據。在此時刻一些新投資者乘機打算接辦，冀望成功後得嗜勝利果實，名為「做下節」。具體做法是必須由原井伙（上節）與新承辦人（下節）協商，雙方若同意合作所議定的條件，則立契約為據。「做下節」的投資人並非都能成功，經營出現危機時，為招徠新投資者，便讓渡自己所佔的部份經營權。這樣原來的上、下兩節變為上、中節，新投資人則成為下節。事實上，有些讓渡還超出三節以上。

所得用作管理開支；(二)從供應大關所管理的滷井的灶，按月撥款負擔管理費用。大關的職責在於確認其所管理設施的運作不受持股人干預，同時也向持股人負責，如定期提交財務報告，並在須對其相關單位作重大決定時，與持股人不定期會商。股份雖或易手頻繁，大關卻賦予企業連續性，其對專門技術面的掌控，也有助於對製鹽業完全外行的人把現金注入工業。作者認為「大關既是股份商品化的結果，也是股份市場發展的貢獻者」。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自貢製鹽業全盛時，當地富榮鹽場即佔四川六成的鹽產量。製鹽為全男性產業，工人都是全職而終身的。鹽業中的大小企業家都是工業資本累積的先驅。何以仍不能帶動當地工業「起飛」？政治環境及現實的轉變，政治力量介入加劇，鹽業則為其財稅榨取的目標，大概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二十世紀軍閥治下的自貢，商人極思藉著與軍閥的聯繫，培植政治及社會資本，以保存個人財富並發展其事業；而軍閥的翻雲覆雨，也給商業組織注入不穩定因素及助長扈從主義。此外作者對自貢發展的本質及其局限有很敏銳的觀察，認為必須從「單一作業」的特點去了解自貢；至抗戰前，鹽還是四川的主要產業，而最大的產業中心則在自貢。自貢成為吸收在省內尋找出路的稀有資本的海綿。影響所及，當地人更沒有理由遠離家鄉尋找商機；反之來自自貢製鹽業的利潤所投資的主要對象還是有如「荒漠中的甘泉」的自貢。直至十九世紀末，天然氣潛在的充裕儲藏量表面上吸收了無數新(岩)鹽滷；鑿鑿新鹽井而外的一切投資都備受妨礙。這樣的生產擴大並沒有透過向前或向後的聯動(forward or backward linkage)而對工業發展產生作用；自貢工場的大部份投入還是來自農業。自貢工業既以礦的提煉為基礎，唯一的希望即在於將存於其豐富滷藏中的其他礦物作多樣化的提煉，但在抗戰前這方面並無進展。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政治及軍事動盪，四川市場經濟混亂及鹽業利潤下降，妨礙了外界的投資及鹽場的科學調查。期間四川交通的基礎建設及對外市場聯繫的改進也乏善可陳。至抗戰前，自貢還是一個以鹽為基礎的城市，易受單一作業的風險傷害，對其境外的工業發展也無甚貢獻。

書中精到之見尚多，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列舉。一本篇幅四百頁的著作小誤難免，但無關宏旨，瑕不掩瑜，實毋庸多贅。

本書選題上乘，資料豐富，論證謹嚴，勝義紛陳，極具啟發性；作者無疑已達成她在序言中揭櫫的目標。本書除了如作者所言，是商業史及社會史而外，管見認為更是一本出色的地方史。二十一世紀初本書的問世，預見本世紀未來一段長時間內，它當會是中國商業史、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最具影響力及重要性的論著之一。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